

共情：中越边民微信对歌的跨文化传播探究

文蓓蕾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530022；

摘要：山歌对唱在中越边境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两国边民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微信群组功能为中越两国人民山歌对唱提供了新的平台，使得对唱活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笔者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的中越边民微信对歌现象进行田野调查，并基于共情传播理论，探讨中越边境地区男女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山歌对唱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分析这种互动形式中，共情传播是如何起作用的。从而进一步为中越跨文化传播和中越共同体的建立提供参考。

关键词：微信山歌对唱；共情传播；跨文化传播

DOI：10.69979/3041-0673.25.12.036

1 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疫情期间，中越边境架设的铁栅栏阻碍了边民实地音乐交流。但微信的普及及其便捷语音功能，为他们架起了新桥梁，使其得以跨越物理阻隔，不受时空限制地进行山歌对唱。

中越边民因地缘毗邻、语言相通，对歌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农耕时期的歌圩文化。笔者在边境陇罕屯的田野调查中，村民谭汉平即为典型例子。他年轻时翻山仅需20分钟即可抵达越南，常与越南人互动（如放牛），更热衷于与越南女孩对歌，有时通宵达旦，足见其便捷性与强大的情感吸引力。如今，微信正延续着这一悠久的跨境音乐交流传统。

中国关于中越对歌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越歌圩民俗文化历史、传播的描述性研究以及对其保护与开发的策略性研究；^{[1][2]}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上谈对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4]在周边传播理论、传播的仪式观、国家文化安全视角、和平外交政策、乡村振兴角度等方面对广西边境地区壮族山歌文化对越交流传播的价值与应用进行探究；^{[6][5][7][8]}壮族布岱族群作为中越跨境民族在歌圩文化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3]在基于微信群的中越对歌研究方面，有学者探讨了龙州左江壮族民歌的微信群互动行为、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优化建议；^[9]另有学者探索了微信群中龙州县壮族山歌文化传承与再生产的具体面貌，并思考了其背后的意义。^[10]即使中越对歌的研究成果有限，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中越边民微信对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笔者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中发现，中越对歌不仅是文化的传播，更是情感的流动，是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的跨文化对话。

罗杰斯提出共情理论指理解他人经历并回应的能力^[11]。共情传播是其与大众传播的跨领域结合，指“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和传递过程”^[13]。它拓展了共情理论，增加了群体维度及传播效果，更具社会化特征^[14]。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个体/群体的信息交流。中越边民对歌即属此类，其基础是共情^[12]。双方文化背景不同，却能基于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进行持续数小时的对歌互动，这体现了共情机制的作用。这正是本文探讨的内容：共情如何在中越边民微信对歌中起作用？对中越跨文化传播有何启示？

2 研究发现和讨论

2.1 主题、结构与情感表达

感情共振的核心在于“同频”，而人类情感同频的基础在于寻求共性——那些共有的、普遍的人类经验，其中爱情是最典型的代表^[12]。无论身处何地、文化背景如何，人类对爱的渴望是相通的。爱构成了共情的重要基石，它能够超越差异，促进更深层次的沟通与理解。在中越边境的山歌文化中，情歌占据着核心地位，其主题包罗万象，涵盖了爱慕、思恋、渴望、赞美、希冀、诱惑、吸引、缠绵、誓咒、决心、离别、逗戏和调情等丰富的情感维度。尽管现代情歌演唱常带有表演性质，但其内核依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与代入，表演形式下涌动着真实的情感宣泄。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从“左江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农瑞群处获得了其新编并翻译、尚未出版的左江壮族民歌集。该歌集收录了多首以爱情为叙事核心的山歌，包括逐卜调夜歌《入除》、月歌三首（《农瑞群新编》、《牌宗传统月歌》、《越南流传月歌》）以及数篇戏情歌。例如，《入除》中唱道：“哪来阿妹满脸笑，给我

暗想阿妹你，心想与妹交连结，不知阿妹如何想”，以直白热烈的语言表达了歌者的爱慕之情。对于观众而言，男女歌手犹如隐秘的代言人，替他们诉说着平日里难以启齿的情感波澜和心理活动。听众在欣赏山歌时，极易将自己的情感经历投射其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歌词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其促进共情的机制：人称与称谓：对歌双方惯用“哥”“妹”这类血缘称谓，隐喻着亲密情感的流动，瞬间拉近了彼此的社会距离，营造出拟亲属般的亲近氛围。情感象征符：歌词中高频出现表达爱意的积极词汇。在《入除》中，“爱”出现40次，“恋”13次，“想”更高达46次，这些密集的情感符号不断强化着歌曲的情感基调。情感叙事弧线：《入除》的情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从狂喜到担忧的复杂转变——担忧家境贫寒配不上对方、担忧对方变心、担忧自己容颜老去对方移情别恋。这些细腻刻画恋爱中普遍心态的情绪起伏，极易引发听众的共鸣和感同身受。

尤为关键的是，《入除》作为流行于中越边境的对歌歌词，其内容直接触及地理与文化疆界：“心想与妹来交情，因为高山来阻挡，不同国度怎么办……何时两国都开关，往来自由恋哥情”。这生动体现了山歌如何成为共情的媒介，帮助边民跨越国界与文化差异的“高山阻隔”，在情感共鸣中缩小文化沟壑，促进民心相通，印证了互惠式艺术传播作为“共谋”的力量。

其次，高效沟通是催化共情的关键途径。要建立深厚的信任与理解，直接而有效的沟通不可或缺。中越边民的山歌对唱正是这样一种高效沟通模式：一方坦率唱出心事（倾诉），另一方专注聆听（倾听），并在轮换时给予恰当回应（反馈）。在这一唱一和、一来一回的互动循环中，信任得以建立，理解得以深化，共情自然生发。歌手们在情感的持续流动中拉近了心理距离，形成一种宛如知己、无话不谈的亲密联结。

2.2 叙事、疗愈与情绪认同

共情快乐假说指出，共情互动能为双方带来积极情绪，修复创伤并习得复原力^[16]。如中越对歌中，女歌手在《入除》唱出悲惨身世（父母早逝、失学、自卑），这些现实中可能隐藏的创伤，通过角色扮演诉说得以外化，本身即具疗愈作用。武志红的能量体理论认为，能量被“看到”便成光明。男歌手倾听后以赞美回应（“好村生出两妹你...样样这么好”），改写了女歌手的生命叙事，使负面情绪转化为光明，实现心灵疗愈。这一过程也重构了关系，具备自愈与疗愈功能。

共情塑造的共同记忆还能形成命运共同体认同^[16]。龙州县微信对歌中，男女歌手平等并列为主体，共同创作。这不仅使女性声音被听见、地位被看见，其表达的

女性自信更塑造了女歌手与观众的共同记忆，形成女性命运共同体认同，并延续至现实（当地女性多掌话语权）。

疗愈与认同又激发亲社会行为^[16]。共情以客观事实为基础^[11]。对歌中，双方叙述亲身经历，悬置偏好，“看见”并理解他者，使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交流模式从“我-他”主客体转向“我-你”主体间性。山歌拉近社会距离，使边境栅栏无法阻隔情感，微信对唱持续连接彼此。

2.3 互动平台、情感空间与行为转化

在媒介智能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中越边境地区的山歌对唱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现今借助现代社交媒体平台——微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微信歌圩既是媒介化的互动平台，也是中越边民们的情感空间。

在龙州县有大大小小许多个中越山歌对唱群，笔者就加入了左江壮族民歌传承人农瑞群组建的微信对歌群中，通过网络田野的方式观察到，农瑞群会不定期组织中越微信对歌，一般是我国派出一名男歌手，越南派出一名女歌手，其他群成员都是观众。对唱期间，农瑞群作为群主会录制好此次对唱的视频或者音频，在结束后发至各大山歌群聊中。农瑞群在接受访谈时谈到，山歌是中越友谊的桥梁，通过微信你转发我转发，而且越南那边也在转发，这你想想，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呀。微信这种新兴的社会化媒体通过技术升级迭代，全媒体、立体化、融合式的传播，催生了新的共情逻辑。这种共情是无意识的，是通过镜像神经元被激活形成的。男女歌手在微信群里以山歌传情达意，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并非并非“决定”要和他人感同身受，而是“自然而然”地感同身受。山歌中苦乐交替、悲欢起伏、哭笑转换，这些丰富的情感变化过程，通过人类生而有之的共情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引起自身的情感波澜。比如听到歌手唱“妹我贫穷怎么办，穷来什么都没有，在世只有一双手，如今妹我如乞丐，就连斗笠没有戴，命运不好就这样，我哪好同阿哥你。”就会唤起观众对贫穷的记忆和命运不济的身份认同。笔者田野调查地龙州县2023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09元，^[17]远远低于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18]而且据笔者观察到龙州县许多家庭以砍甘蔗为主要收入，笔者深度访谈的对象从越南嫁过来的两姐妹，同时也是龙州县数一数二的歌王，她们半夜两点去甘蔗地砍甘蔗，第二天中午才能休息，期间在泥巴地里砍甘蔗、搬运甘蔗，而且又是大半夜乌漆嘛黑的，真的非常辛苦，但一天的劳动收入才只有200元左右。据笔者在中越对歌微信群里观察到，越南女歌手一人穿着几块钱一双的拖鞋，一人

穿着解放鞋,坐在田埂边跟我国边民对歌,从他们的穿搭表征和所处环境来看,经济状况也堪忧。对处于这种环境的中越边民来说,表达悲惨命运的山歌就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从而无意识的转发,就如农瑞群所说“你转发,我转发”就形了共情传播的仪式链,使得中越边民在山歌对唱的情感空间内形成互惠式理解,跨文化传播也在中越山歌对唱实践中形成了可能。

3 结语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从共情传播的三个阶段情绪、认知和行为,解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中越边境边民们微信对歌的共情效应触发机制。由此可以看出,中越边民微信对歌的跨文化传播能够如此顺利的进行的原因是边民们彼此间的深度共情。山歌作为中越边民思想意识和生活的投影,天然具备讨论边民们隐于内心的人生观、婚恋观和宿命观等主题的能力,也与观众有着天然的情感共鸣。从山歌内容来看,它采用了不同文化中的做大公约数,取得了歌手之间、歌手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效果。在当下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下,通过微信群组、视频通话、语音聊天、转发等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中越边境的山歌触达了更广泛的人群,也为中越人民在互惠式理解下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正如乔纳森·特纳所言,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以生成对广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承诺。^[15]因此,在中越共同体的背景下,想要中越两国更好的实现跨文化传播和民心相通,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好山歌这个天然共情的媒介,创造性地保护和传承山歌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立足于中越文化的共同点,创作出能使双方共情的艺术作品。这样才能达到中越跨文化传播的理想效果,才能更好的建立中越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赵明龙.中越壮岱族群歌圩民俗文化及其保护与开发[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03):12-18.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1.03.013.
- [2]覃聪颖.探究广西边境文化传播的保护与建设——以龙州县天琴、山歌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3,(19):119.
- [3]朱艳霄.壮族布岱族群女性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D].广西艺术学院,2015.
- [4]黄桂秋.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J].

广西民族研究,2016,(05):85-92.

- [5]王文怡.中越跨境文化传播研究[D].南宁师范大学,2021.DOI:10.27037/d.cnki.ggxsc.2021.000208.
- [6]卢晶玲.广西边境地区壮族山歌对越交流的价值与应用研究[D].广西大学,2021.DOI:10.27034/d.cnki.ggxju.2021.000621.
- [7]陆晓芹.民间歌唱传统与中越边境乡村之“魂”的重铸——基于广西龙州壮族歌圩习俗的考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5):117-123.
- [8]罗玉华,彭涪皓,毛宏龙.中越边境地区壮族歌圩文化的作用与传承[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6(22):140-143.
- [9]朱彤.龙州左江壮族民歌的微信群互动研究[D].南宁师范大学,2023.DOI:10.27037/d.cnki.ggxsc.2023.000268.
- [10]莫若兰.基于微信群的龙州县壮族山歌文化传承与再生产研究[D].南宁师范大学,2023.DOI:10.27037/d.cnki.ggxsc.2023.000889.
- [11][美]亚瑟·乔拉米卡利[美]凯瑟琳·柯茜.共情的力量[M]王春光,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8(12)
- [12]黄少静.跨文化背景下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的共情叙事与文化隐喻[J].电影文学,2024,(16):137-141.
- [13]赵建国.论共情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6):47-52.
- [14]孙大东,杨子若.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问题分析、运行机理与策略优化[J].档案学研究,2024,(04):95-102.DOI: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4.04.011.
- [15]情感社会学[M].(美)特纳(Turner,J.H.), (美)斯戴兹(Stets,J.E.),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6]普法泰歇.S,诺库尔.L,萨森拉特.C,彼得森.M.B.:行动的情感路径:同理心促进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行为,《心理科学》,2020年第31卷,第11期,第1363-1373页。
- [17]2023年龙州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18]国家统计局,2023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作者简介:文蓓蕾(1996.8),女,汉族,湖南省永州市,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